

中华美国学会

中华美国学丛书

韩 铁 著



**福特基金会
与美国的中国学**
(1950—1979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华美国学丛书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

(1950—1979 年)

韩 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福特基金会与美国的中国学/韩铁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

(中华美国学丛书)

ISBN 7 - 5004 - 4509 - 1

I. 福… II. 韩… III. 中美关系 - 国际关系史 - 研究 - 1950 ~ 1979 IV. D82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648 号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王应来
封面设计 王 华
版式设计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 页 2

字 数 323 千字

定 价 2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都会有自己决定盛衰的历史关头。一个学术领域也不例外。美国的中国学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麦卡锡主义的政治高压下，就曾濒临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关头，福特基金会逆流而上，力挽狂澜，几乎是一手将美国的中国学从黑云压城欲摧的绝境中拯救出来，并在 60 年代使这个学术领域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十年大飞跃时期。到 70 年代初中美对话的大门重新打开时，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隔绝并没有在美国的中国学领域造成人才短缺。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人才济济和欣欣向荣的景象。中国学在当时美国的非西方研究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举足轻重。当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在这个政治上过于敏感、经济上又暂无利益可言的学术领域里退避三舍时，福特基金会为什么能创造出这样一个奇迹？我希望读者在看完本书后能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也想将此书献给那些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地位上为了自己的信仰和见解，当然也是人类的长远利益，而敢于逆水行舟和勇往直前的人们。

我对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研究是 20 世纪 90 年代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求学时完成的。这所坐落在威斯康星州首府麦迪逊的美国名校曾经有过像弗里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约翰·R. 康芒斯、默尔·柯蒂、威廉·A. 威廉姆斯和 J. 威拉德·赫斯特等一代史学家，是美国几大史学流派的发源地。在历史系所在的人文

大楼旁的威斯康星州历史协会图书馆里，白色大理石的雄浑建筑和他丰富的图书资料及档案文件令人叹为观止。学习和研究之余，人们可以信步登上古木参天 and 绿草如茵的大学山，到林肯铜像旁遥望州议会大楼的穹型尖顶，或者到近在咫尺的曼多塔湖滨，在众多学子聚集的露天平台餐座上一览蓝天碧水和蜿蜒的沙滩，德国啤酒和烤香肠的气味顿时扑面而来。当然，到了冬天你看到的将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些在冰湖之上凿洞垂钓的人，不禁会使你想起“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句。这是一个能让人潜心做学问的地方。因此我要对那些有志赴美研究美国历史的中国青年学子说：哈佛并不是惟一的圣地，麦迪逊也是你可以选择的麦加。

我就是在这个美国历史研究的前沿重镇得到了许许多多著名学者的指导和帮助。我的导师斯坦利·I. 柯特勒教授（Stanley I. Kutler）是美国宪法史和战后美国史的权威学者之一。他是《美国历史书评》杂志的创刊主编，在主持刊物 20 年之后的 1997 年才卸去了这一职务。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敢于为真理搏斗的勇者。前总统尼克松的部分录音磁带就是因为他坚持知情权并诉诸公堂才被迫解密的。在我和他相识相处的近 20 年时间里，他不仅视我为他的学生，而且待我如他的亲人和朋友。当他夫人因感伤岁月流逝而不想举行 50 岁生日晚会时，柯特勒教授却偷偷安排，要我和他的至交好友们一起参加了那个使他夫人出奇不意并破涕为笑的晚会。我知道他对我寄予厚望是因为他热爱中国这个有着古老文明和传统的国家。他的夫人在把我介绍给他们的朋友时常常半开玩笑地称我为“*tae prince from China*”。没有柯特勒教授的言传身教和各方面的帮助，我是不可能在美国完成我的学业的，也不可能写出这本有关福特基金会和中国的中国学的专著。我现在希望的是在自己学术生涯剩下的岁月里做一点扎扎实实的研究和著述，使我远在威斯康星已经退休的恩师能够笑着对别人

说：“He did his job.”（他做了他该做的事。）

我在威斯康星大学求学和完成本书课题研究的过程中需要感谢的人很多，其中主要还有以世界体系论来阐释冷战的著名美国外交史专家托马斯·J. 麦考密克教授（Thomas J. McCormick），以研究李大钊和中国共产党著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莫里斯·迈兹勒教授（Maurice Meisner），以对美、德铁路发展史进行比较研究而著称的企业和技术史学家科琳·邓莱威教授（Colleen Dunlavy），以研究社会史和城市史而著称的斯坦利·舒尔茨教授（Stanley Schultz），以研究19世纪初美国工业化而著称的黛安娜·林思特罗姆教授（Diane Lindstrom），以研究美国经济治理而著称的J. 罗杰斯·霍林斯沃思教授（J. Rogers Hollingsworth），以研究美国内战而著称的理查德·苏维尔教授（Richard Sewell），以研究殖民地时代清教思想而著称的查尔斯·柯亨教授（Chuck Cohen），以研究美国革命而著称的琼·李教授（Jean Lee），以研究“金三角”和东南亚史而著称的艾尔弗雷德·麦考伊教授（Alfred McCoy），以研究中国思想史而著称的中央研究院院士林毓生教授等等。他们的学识使我在学术探讨上受益匪浅。他们的热忱使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度过的八年时光变得如此令人怀念，以致麦迪逊在我心目中自然而然就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除了这些威斯康星人以外，我在研究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时还得到了福特基金会工作人员、前基金会官员、中国学学者专家和有关的档案工作人员的帮助。前福特基金会国际训练和研究项目部主任约翰·B. 霍华德（John B. Howard），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前驻缅甸大使约翰·斯科特·爱维尔顿（John Scott Everton），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负责官员之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A. Doak Barnett），前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顾问人员之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霍华德·波曼（Howard Boorman，中文名：包华德），前哥伦比亚大学忧患亚洲学学者委员会负责人、

著名中国学学者莫斯·罗伯茨教授（Moss Roberts），前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唐·K. 普赖斯（Don K. Price）的儿子唐·C. 普赖斯教授（Don C. Price）等都曾详细复函解答本人提出的有关问题。特别是已故的鲍大可先生生前还在华盛顿接受了本人的采访，对我的研究方向和思路多有肯定。前福特基金会副主席弗兰西斯·X. 赛顿（Francis X. Sutton）与我在纽约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使我对基金会董事会的运作有了清楚的了解。由于本书基本上是以原始档案文件为基础的，福特基金会档案馆的资深档案专家艾伦·迪瓦克（Alan Divack）为我在该馆从事研究提供的不仅是机会，而且是一个钟爱档案事业的内行的毫无保留的指导。否则，我在一箱箱的文件和大量的缩微胶卷上不知要多花多少工夫。如果现在有人问我在纽约最喜欢去哪里，我会说不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象征的自由女神像，也不是已夷为平地的世界贸易中心，而是福特基金会摩天大楼地下室里的档案馆。此话并非戏言。另外，美国国家档案馆、哈佛大学档案馆、阿默斯特学院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也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方便。

最后，我要感谢我在中国的恩师刘绪贻教授把我带进了美国史的学术殿堂，感谢南开大学李剑鸣教授催促我完成中文书稿，感谢福特基金会提供的《中华美国学丛书》出版资助。

对于一个有幸得到如此之多帮助的人来说，感谢就是永不忘却。

韩 铁

2003年6月4日于南开大学

目 录

序	(1)
导言	(1)
第一章 历史关头：冷战、麦卡锡主义和 理性慈善	(13)
第二章 初试龙潭：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 出炉及其早期运作	(72)
第三章 十年飞跃：中国学在美国学术界 的大发展	(130)
第四章 象牙塔外：中国问题的政策研究、 公众教育和国际努力	(222)
第五章 跨越大洋：从美国的中国学到中国 的改革	(305)
结 论 从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看福特 基金会的中国项目	(352)
参考文献资料目录	(373)

导 言

在冷战阴云密布，中美敌对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岁月里，福特基金会在促进美国和西方中国学的发展上发挥了十分独特的作用。人们对此可能褒贬不一，但是谁都不会否认福特基金会曾作出巨大贡献的事实。麦乔治·邦迪在担任福特基金会主席时称此贡献为一场“革命”^[1]，而对福特基金会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大卫·霍罗维茨也承认：“福特基金会当时采取的行动……就一个具体领域而言，其规模在教育投资上是史无前例的。”^[2]

尽管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领域有过如此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却相当有限。已故的约翰·M.H. 林白克教授在他的《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一书中曾盛赞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贡献。然而，这只是他在1970年对西方中国学学科进行调查评估的一个组成部分。由于专注于20世纪60年代，即所谓美国的中国学“十年发展时期”，林白克对福特基金会是如何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50年代断然开始其中国项目则未多作笔墨。当然，他的不幸早逝更使他不可能讨论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在70年代发生的方向性变化。不过，作为被福特基金会请来对中国学做调查评估的专家，林白克对于1959—1970年期间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领域的投资规模提供了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数字：“福特基金会单独投资约30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和大学一道通过国防教育法也开支了大体相同的数额。”^[3]这就是

说，在美国的中国学领域获得经济资助最多、也是最关键的年代里，有一半投资来自福特基金会。

在林白克出版《理解中国：美国学术资源评估》一书17年之后，乔依丝·卡尔格兰和丹尼思·弗雷德·赛蒙编辑出版了《中美教育交流文集》，其中收入两篇有关福特基金会资助中国学的文章。一篇是沃伦·柯亨教授所写。他在论述1949—1971年中美文化关系时，对福特基金会的中国项目做了简单扼要的历史回顾。另一篇文章则出自福特基金会前副主席弗兰西斯·赛顿的手笔。作为局内人，赛顿阐述了包括福特基金会在内的各大基金会有关中国的活动。这两篇文章都对福特基金会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所作的长期努力予以肯定，但是由于篇幅太短而难以展现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全貌和完整历史。^[4]

除了这些肯定福特基金会的著作和文章以外，长期以来美国存在两种对福特基金会上述活动持批评态度的不同观点，矛头直指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尤其是中国学。第一种观点可称为“国家支配论”，是由思想比较激进的亚洲问题学者提出的。他们组成的哥伦比亚大学忧患亚洲学学者委员会，在1971年反对越南战争的浪潮中，发表了关于“美国亚洲学权势集团”的调查报告。其领导人莫斯·罗伯茨还在《忧患亚洲学学者通讯》上撰写了题为“关于当代中国学的结构与方向的几个问题”的文章。这些报告和文章打破了老一代中国学学者的沉默，指责“福特基金会利用它的金钱和政治权力制造和影响了这个（中国学）领域，使之服务于政策和情报机构的目标”，^[5]从而在美国的亚洲学和中国学学者中引起了长期的争议。

二十多年以后，这些学者所关注的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再次成为1997年《忧患亚洲学学者通讯》专辑讨论的中心。专辑的议题是“亚洲、亚洲学和国家安全国家”。由于对朝鲜战争的精深研究而享誉学术界的布鲁斯·卡明思教授是这个专辑的核心撰

稿人。他追溯了美国地区研究学术领域的冷战起源，阐述了“国家—情报机构—基金会轴心”在这些学科领域的作用。卡明思教授认为，福特基金会是在与中央情报局密切磋商下，帮助并造就了战后的地区研究和比较政治学科。同样是在这个专辑中，莫斯·罗伯茨教授再次批评国家对中国学的控制。他甚至说“一般对学术生活所抱有的想象——‘多元主义’、‘观念的市场’、‘市民社会’——在亚洲学很少是事实，在中国学则根本不是事实。那里是人们论及中国时所说的由上而下的‘中国式’模式。”显然，这些学者强调的是国家左右了地区研究，特别是中国学。他们把福特基金会看作是国家机器的仆从与合伙人，或者是卡明思教授所说的“国家—情报机构—基金会轴心”的组成部分。^[6]这种“国家支配论”令人怀疑的地方在于：福特基金会在国际问题研究上与国家政策情报机构的目标就真的那么一致，不需要加以区别吗？

与忧患亚洲学学者的观点形成对照的是，罗伯特·麦科依教授在1984年出版的《国际问题研究与学界》一书中得出了全然不同的结论：学界支配论。他认为是学界而不是国家左右了这些学科领域。在麦科依看来，福特基金会在五六十年代大力资助国际问题各个学科所造成的结果是所谓“学界圈地”。由于过分热衷于在大学里推动国际问题研究，学界和福特基金会的官员们几乎从头到尾“都忽略了大学以外对这个学术领域的需要”。麦科依指出，这种把国际问题研究圈为学界独占领地的做法，“是和最初促使（福特基金会）介入的两个明确目标相矛盾的”。这两个目标是：（1）增加“受训在涉外政府部门、教育界、企业界……服务的美国人的数目”；（2）“扩大公众理解国际问题的基础”。因此，麦科依认为，福特基金会和学界在国际问题研究上合作互动的结果，不是“施惠者使受惠者转而服从自己的目标，而是相反”。换言之，学界使福特基金会臣服于自己的目标，从而成为

这个领域的主宰。^[7]这种“学界支配论”也有令人质疑之处。那就是：福特基金会和学界在国际问题研究上的目标真的有如此之大的区别，以至于最后需要一方放弃自己的立场，俯首称臣吗？

不管这两种观点各有什么令人质疑之处，忧患亚洲学学者的“国家支配论”和罗伯特·麦科依的“学界支配论”，倒是福特基金会在中国学和国际问题研究方面的作用，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根本问题，即政府、基金会和学界的关系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理论框架和确凿无疑的档案文件。林伯克、柯亨、赛顿在他们的报告和文章中没有回答这个根本问题，也许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面对这个问题。忧患亚洲学学者和麦科依教授虽然抓住了根本，并对政府、基金会和学界的关系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但他们和林伯克、柯亨、赛顿一样，未能对福特基金会有关中国项目的档案文件作深入、细致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因此，在福特基金会介入中国学的发展上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白。本书为填补这一空白，在尽可能充分利用福特基金会档案文件的基础上，以历史综述的方式对福特基金会是如何将美国的中国学建设成一个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领域作了比较全面的透视和分析，并对这一历史过程中政府、基金会和学界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从理论上来说，我既不同意“国家支配论”，也不同意“学界支配论”。因为这两种解释把复杂的关系说得像单行道似的简单，结果缺乏足够的史实来支持其论点。相比之下，过去30年来美国学术界在涉及基金会、慈善事业和非赢利部门的两个重大问题上进行的争论，倒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的理论线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基金会或者说非赢利部门与美国社会其他两个部门即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问题。第二个问题则是关于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的关系问题。在第一个问题上，争论集中在非赢利部门对其他两个部门的独立性上，即它是否能不受政府和企业的左右。

一般来说，非赢利部门的人大都相信自己部门的独立性。卡内基基金会主席约翰·加德勒曾经指出：

这个部门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也许就是它不受约束的相对自由和因此而来的多元主义。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所有的人都可以追寻他们所向往的理想或项目。与政府不一样，一个独立部门的团体不需要弄清楚它的想法或哲学是否得到大量选民的支持。与企业部门也不一样，他们不需要只追随那些能谋利的想法。如果少数人想支持新的理念，他们并不需要很多人的认同。^[8]

这种观点得到了一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所作的理论分析的支持。他们认为，非赢利组织从事的活动一方面没有足够的利润来吸引企业界，另一方面又没有足够的公众支持来吸引政府。这些组织做的是企业和政府不想做也未能做的事。因此，“市场失败论”和“政府失败论”成为这些学者的中心论点。^[9]

然而，早在1981年，列斯特·萨拉蒙和艾伦·阿布拉姆逊在非赢利组织关注的领域里就联邦开支情况进行研究时，就对这个部门的独立性提出了质疑。1987年，萨拉蒙又进一步指出，非赢利组织的活动之所以成为必要，既不是因为“市场失败”，也不是因为“政府失败”，倒是非赢利部门的不够分量、囿于一方、家长作风和业余行为等问题导致政府采取行动，以支持非赢利部门。事实上，他认为“政府和志愿部门的合作是这个国家国民服务供给体系的支柱，也是这个国家非赢利部门的基本财务现实”。^[10]里根政府内的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也发现“政府的钱通过资助与合同流入了‘那些以非赢利机构名义活动的可恶的政治组织手中’”^[11]。

以研究非赢利部门而著称的学者彼得·多帕金·霍尔在论及这

场争议时指出：“任何人如要认真考虑非赢利部门在美国政体中的地位，首先就要接受学术界承认部门彼此渗透的政策含义。”他所说的“彼此渗透”一方面是指非赢利部门具有依赖性，并非独立不羁，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对于战后年代政府机器增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在发展自己的政策制定和分析能力上令人惊讶地失败了。于是，政府在方法意图上变得日益依赖大学、基金会和政策研究机构。”霍尔关于非赢利组织的定义也反映了这种建立在相互依赖基础上的彼此渗透。根据他的定义，非赢利组织是“以实现以下三项目标之任何一项为己任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1）完成国家分派给他们的公共任务；（2）完成国家或赢利组织都不愿意满足其需求的公共任务；（3）对国家、赢利组织或其他非赢利组织施加影响”。^[12]

强调非赢利部门与国家的相互渗透不仅可以理解，而且相当重要，因为“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年代里，政府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急剧扩大。不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忘记根深蒂固的美国传统的长期影响，借用巴里·卡尔与斯坦利·凯茨教授的话来说，就是“美国人不愿意授权国家政府来设定社会福利的全国标准，更不要说来执行这些标准”。据这两位学者研究，美国私人基金会作为“一种全国性慈善体系，即致力于增加人类福利的私人组织”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部分原因就在于美国人拒绝“让联邦政府成为全国社会改革的中心”。^[13]直到“新政”，联邦政府才开始在全国社会政策上处于中心地位。有趣的是，政府权力的扩大并没有阻碍，反倒是刺激了私人非赢利部门在战后的发展。这种平行扩展的原因之一就是联邦政府常常要依靠非赢利组织的帮助来提供社会、文化和福利方面的服务。萨拉蒙把这种关系的形成看作是“在美国政治思维中一方面希望有公共服务，另一方面又仇视提供服务的政府机

构所造成的长期冲突”的结果。非赢利组织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吸引了很多美国人，因为它们被视之为“在避免不恰当扩大国家行政机构的情况下增加政府在促进大众福利方面的作用”的一种方式。^[14]

由以上概略性介绍可以看出，夸大非赢利部门的独立性和否认其独立性同样都有欠妥当。应该说，相互渗透更为准确地表述了非赢利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的关系。这种相互渗透是以彼此依赖为基础的，依赖本身就说明对方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非赢利组织既有依赖性，又有独立性。这种看上去似乎相互矛盾的特点其实来源于非赢利组织本身的双重性：它是提供公共服务的私人组织。美国社会抵制强大国家机器的传统和现代政府部门的迅速扩大之间形成的历史性妥协，则进一步加强了非赢利组织的双重性，因而也使这看似矛盾的特点显得更为突出。国家对非赢利组织的影响虽然愈来愈大，但它并未也不想完全左右后者的活动，更没有使非赢利组织仅仅成为国家的工具，即便在冷战时代亦不例外。

至于学术界争论的第二个问题，即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涉及两种完全不同的学术理论之间关于基金会的争议。一种是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cultural hegemony）。赞成这种理论的学者包括唐纳德·菲希尔、罗伯特·阿诺夫和爱德华·伯曼。他们认为：“大基金会通过它们对文化生产与传播的控制来扩大统治阶级的主导。它们具有战略考虑的资助能使具体观点合法化，也能同时使其他观点贬值。”^[15]与“文化主导论”形成对照的另一种理论是“学术自由论”。赞成此种理论的巴里·卡尔和斯坦利·凯茨认为，学术领域的“重大研究方向”主要是由学术界，特别是学术领袖，而不是由基金会经理们决定的，因为“后者和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控制基金会方向的年轻一代董事们，是对学术自由的原则作出了明确承诺的一代人”。^[16]

这两种理论在解释美国基金会活动中的资助者与被资助者关系上有一定的可信性，但都存在严重问题。对于伯曼等人阐述的“文化主导论”来说，基金会从来就没有把它们活动的主要目标集中在伯曼所说的“具体观点”上，因为“美国慈善家不同于君主和教皇，他们知道自己在思想上是个依附阶级”，在具体观点上必须仰赖学者们的判断。^[17]对于“学术自由论”来说，基金会虽不大介意具体观点，但对学科方向却很注意，因为这不仅涉及学术，而且涉及超出学术领域之外基金会更为广泛的关注。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卡尔和凯茨低估了基金会对美国学术发展的影响。

相比之下，苏珊·奥丝荃德和保罗·谢尔维希后来提出的、将慈善定义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理论，似乎更有助于对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如果不是进行解释的话。他们的定义如下：

和其他的社会关系一样，它是一种交易，双方为建立和维持这种关系，都有索取，也都有给予。同时，在这种社会交换和很多其他的社会交换中，双方的关系不是平等的。由于多种原因，捐助者和受助者之间的权力差别是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由当今慈善事业的特点中产生的。总的趋势是：捐助者的地位使他们比受助者在确定慈善交易和如何参与其间上，有多得多的积极的选择。受助者也能有选择，而且确实作出了选择。他们的选择对自己和捐助者都产生了影响，并形成了慈善事业的组织方式。^[18]

显然，作为社会交易的参加者，任何一方都不会仅仅是对方社会行动的消极承受者。只要他们之间的关系仍然存在，他们就处于一种不停的相互影响的社会交往过程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各大基金会和学术界在这种社会交往过程中往往形成了一致意见，而不是根本分歧。这种一致性使我们有理由怀疑麦科依教授所谓福特基金会国际问题研究上屈从于学术界的必要性，它同时又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卡尔和凯茨教授的学术自由论其实是以这种一致性为基础的，因为基金会经理们在对学术自由作出承诺时，对这种一致性的形成充满信心。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一致性提醒我们，葛兰西的“文化主导”并不是如伯曼教授所说的、以具有战略考虑的资助来左右具体观点的形成，因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毫无战略意义可言。真正符合葛兰西理论的“文化主导”就是要形成广泛共识，掌握“思想和道德上的领导权”。这才是我们研究福特基金会对中国学的支持时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深入探讨的一个理论视角。

基于“相互渗透说”、“社会关系说”和葛兰西“文化主导论”提供的思路线索，并参照前述学者的有关著述，我在福特基金会、哈佛大学、阿默斯特学院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里就有关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的有关档案进行了极为广泛和比较彻底的查阅。福特基金会档案馆的资深管理员艾伦·迪瓦克先生告诉我，过去还从未有人像我这样对他们有关基金会中国项目的文件下如此之大的工夫。我从档案研究中发现，福特基金会支持中国学发展的过程中虽然同政府和学术界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从未完全受政府的指挥，也从未仅仅听命于学术界。福特基金会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目标和行动日程表。它虽然深受冷战和学界利益的影响，但却远远超越了“国家安全国家”和“学界圈地”的狭隘性，实际上服务于美国资本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长远与根本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福特基金会的行动只有用葛兰西的“文化主导”论才能加以解释。事实上，在中国学领域里，既不是“国家安全国家”也不是学界，而是福特基金会首先主动采取行动来重振、发展和扩大了这个学科。这不仅是对外部世界变化